

風蕭蕭兮易水寒

于衡

——追憶王新衡先生（本文插圖刊54頁）

兩次坐牢一度被刺

民國七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，八十七歲的張學良到榮民總醫院中正樓，探視養病中的王新衡，他們談了近一小時，當日是「西安事變」五十週年。王新衡當天晚上告訴筆者說：西安事變的前一天，也就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，他本人赴西安就任委員長西安行營第二處處長（註一），第二天他和先總統蔣中正先生等一行，同被張學良和楊虎城扣留在西京招待所。王新衡說，事情就是那樣出奇——世界上那有第一天就職，第二天便「坐牢」的事。王新衡說：「民國十八年秋（一九二九）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被史達林統治下的俄共鬥爭了三天三夜，然後交給格伯烏（註二），坐牢四個月。王新衡說：「人的一生活過兩次政治性的牢獄，和由於政治上的理由，被敵人打了兩槍，但却保住了性命。到了晚年還能悠遊於林泉之間，做『從心所欲不逾矩』的事，應該是前世修來的。」然後他補充了一句：「俱往矣！」用語體文來解釋，則是「一切都已成為過去了。」

大隱隱於市的生活

筆者與王新衡先生相識，是在民國四十一年春，在監察院長于右任先生的青田街寓所，那時我是「香港時報」總社的採訪副主任，負責採訪臺北地區的政治新聞。

幾乎每次找到右任先生處採訪時，都會遇到新衡先生，他對右老執弟子之禮，因為他在讀莫斯科中山大學之前，在于右任所創辦的上海大學念過書，那是民國十四年的事。新衡先生在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撤守時，被派往香港，擔任中國國民黨南方執行部代主任委員，被中共稱為國民政府派駐香港的「特務頭子」，因而在三十九年十月二日，遭中共所派的兩名刺客狙擊，王新衡身中兩顆子彈，經送往醫院手術後，僅取出一顆子彈，另一顆子彈一直留在他的肺部中。在傷勢稍為平復時，他返回臺北。

王新衡先生自民國十九年冬自蘇俄返國，到民國三十九年秋在香港被刺，那二十年間，正是中國歷史上變動最大的時代。王新衡說：他自己腦內裝滿了中國現代史，而且有些是「秘史」。他舉例說：他在蘇俄集中營時，常想到一首詩：「風蕭蕭兮易水寒，壯士一去兮不復還」。「西安事變」時，他剛剛三十歲，在西京招待所內被拘禁時，也想到「風蕭蕭兮易水寒……」。民國

三十九年在香港被刺時，他四十四歲，算得上是少壯派。當他身中兩顆子彈時，他自己在想真是要「壯士一去兮不復還」了。但却又能很平安的回到臺北。在臺北的卅六年，他過的是：「大隱隱於市」的生活，有時他到立法院坐一坐，但很少看到他參與表決。

對政治有瞭解的人，都知道他是蔣總統經國先生莫斯科時代的同學，但他從來不向經國先生請託任何事情。有一次他告訴筆者：經國先生之所以能「忍辱負重」，是由於在蘇維埃下放時所磨鍊出來的。另外他也告訴筆者：經國先生在國民黨提名他做總統候選人時，曾經向王新衡徵求意見，特別是美國方面的反應。新衡先生的答覆是：為了苦難的國家，應該挑起這個重擔。至於美國的反應，應不予重視，理由是：「支持先總統的美國政治家必然也會支持您，反對先總統的美國政客，也必然會反對您。」

寫文章比什麼都好

新衡先生十分尊重讀書人，也願意和文人交往，民國七十二年底，我高票當選教育團體的立法委員，他並未表示高興，僅請我在外邊喝了杯咖啡。並且說，新聞記者做不好，就是「文化流

恨」，立法委員做不好時，就是「政治流氓」。所以他不以爲我做立法委員是件好事。去年年底，我以五千票之差落選了（註三），新衡先生却向我道賀。他說寫文章比什麼都好，至少可以不再向「黨官」折腰，及向「國會記者」低頭，我聽不懂「折腰」兩字的浙江發音，他複述一遍，我仍聽不懂，最後他說：「陶淵明不願以五斗米折腰」的折腰，我才恍然大悟。

七十五年十二月中旬，我任進榮總作身體檢查和靜養，新衡先生常到我的房間「聊天」，我也常到他的房間「問候」，他對於華視晚間八點檔的「皇帝與公主」消閒性的連續劇，極爲欣賞，每晚必看。他也曾說榮總辦得不錯，鄒濟勳的管理才能和姜必寧的敬業精神，都值得其他公營或國營事業效法。新衡先生說：他極其希望舊曆年時，能回家過年。如果心臟繼續衰弱無力，過完年後，再搬回醫院，等春暖花開時節出院。

新衡先生在住院期間，雖然住的是特等病房，但他却很寂寞，他常常一個人坐在十一樓的中庭花園中沉思，七十六年一月四日晚間八時許，我準備到他的房間內陪他聊天，走到門口時，看到房內的燈光很暗，我想他或許已經休息（註四），便沒有推門而入，沒想到五日清晨，護士告訴我：「王先生已經在天亮之前走了，他是在睡眠中悄悄的走了！走得好安適。」我驚叫了一聲，頓時覺得眼前一片漆黑……。

中國現代史見證人

新衡先生確實走了，他走得那麼遙遠，那麼

從容，他是多災多難的中國現代歷史的見證人。他不止一次的告訴筆者，他做了大半輩子特務，却沒有傷害過一個人。他也常常提到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畢業後，留校擔任俄文翻譯，並在共產國際東方部中國問題研究所，擔任中國問題之研究。就在那一段時間，被王明（陳紹禹）控告他反對史達林指揮中共採取蘇維埃暴動政策，因此他在民國十八年下半年被蘇俄特務機關監禁四個月，釋放後下放到蘇俄南部勞動改造。民國十九年多，才被遣返經海參崴返回上海。

新衡先生返國後翻譯了：「格伯烏」——赤卡的工作一書，當時蔣委員長十分欣賞他的才華，於是他被派爲委員長南昌行營的調查科長，後轉任軍委會調查統計局特務處上海站長等職。

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，對日戰爭開始，王先生被調任軍統局香港區區長，直到民國三十年（一九四一）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，香港被日軍攻佔，他才化裝成漁民，返回重慶，就任軍統局第二處長。他不止一次向筆者說：戴雨農（笠）先生對部屬的信任，是他終生難忘的事。譬如戴先生急須解決的「人與事」，常把對方介紹給王新衡，然後說：「這件事從現在起交給王處長處理，他所做的決定，就是我的決定。」王新衡說：西安事變後的張學良，戴先生僅指示一個原則，其它一切均由王新衡決定。因而近五十年來，他和張學良成爲好友。

滾滾長江淘盡英雄

民國卅四年（一九四五）八月中旬，對日抗

戰勝利，他自重慶隨上海市長錢大鈞，飛返上海，當時他的職務是上海市政府參事兼調查處長。民國三十六年，他當選上海市選出的立法委員，他自己說：他不是一位十分稱職的委員，因爲他很少到立法院開會。但人們都知道，他對國家的貢獻，却是無量大。他自己很喜歡「有容乃大，無欲則剛」這八個字，我常聽到他的笑聲，看得出他的有容乃大，由於他對人毫無所求，才表現出他的無欲則剛。

如今他走了，走得那麼遙遠，那麼瀟灑，但和他相處的朋友，都深深的感到，失去一種找不回來的重要感情。

筆者在立法院工作三年，參加過多次治喪會，但到會的人數之多，爲過去所沒有的，因而使用了審查預算時大家吵吵鬧鬧的大會議廳，而且座無虛席。這是王先生的做人成功之處，也證明這個社會仍然有大是大非。

新衡先生在日，常愛吟詠：「滾滾長江東逝水，浪花淘盡英雄，是非成敗轉頭空，青山依舊在，幾度夕陽紅……。」如今青山仍在，夕陽如故，只是中華民國少了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，使國家顯得格外寂寞。

（註一）委員長西安行營，爲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在西安的重要辦公處。

（註二）蘇俄的特務機構。

（註三）教育團體立法委員當選者第二位票數爲一萬一千四百七十四票。

（註四）一月四日爲星期天，華視不播出「皇帝與公主」